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當代臺灣小說中的後現代美學與階級意識

Postmodern Aesthetic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doi:10.6752/JCS.201603_(22).0007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林運鴻(Yun-Hung Lin)

頁數/Page：177-20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0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Postmodern Aesthetic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Lin Yun-Hung

當代臺灣小說中的
後現代美學與階級意識

林運鴻

本文由我的博士論文《解嚴後台灣小說中的資本主義體制與階級意識》部分章節改寫而成，同時尤其感謝兩位審查委員以及編委會的詳實建議。

林運鴻，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助理。

電子信箱：picaball34@hotmail.com

摘 要

本文主要以1980年代末期、受到後現代美學思潮影響的當代臺灣小說為討論對象，思考透過文學文本所表達出的「階級意識」。本文首先討論的是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誤識」，也就是在當代臺灣小說中，人們為何無法理解自己真正的階級利益、為何接受自身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被統治的現狀。其次，透過當代臺灣小說中對於生活風格、消費主義的高度嚮往，我們也能觀察到，「後現代文類」有著強烈的階級性格，後現代美學常常首肯了中產階級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第三，本文也試著分析臺灣後現代小說中的「愛情敘事」，該文類中對於浪漫愛情的追求，同時也負載了對於階級流動的樂觀嚮往，這也能夠解釋，為何「後現代小說」常常在認知到階級分化現象的同時，卻沒有發展出對此現象的批判。最後，我們要處理的是較宏觀的「歷史」問題。當代臺灣小說那種強調後設與解構的後現代美學，其實也質疑了社會主義思想所通向的解放政治，從而合法化了以進步與發展為名的資本主義歷史過程。整體而言，臺灣小說中的後現代美學，儘管敏銳地辨認出了臺灣社會的經濟性格與階級不平等，但是後現代文類對於臺灣社會的階級關係，仍持有某種保守的態度，其觀點是：一方面，結構面的不平等還是能夠透過個體努力來克服；另一方面，階級不平等則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產物。

關鍵詞：階級意識、虛假意識、馬克思主義、臺灣後現代小說、臺灣文學史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meditation on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as expressed in literary texts by examining the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 aesthetic movement in the late 1980. First of all, I discuss the misrecognition of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namely why people fail to truly understand their class interests, as well as why they tend to accept their own status quo of being governed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capitalism. Next, through the intense longing for consumerist lifestyles revealed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we can make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postmodern genre” not only has its strong classism but postmodern aesthetics often approves of the bourgeois pursuit of material comfort and wealth. Third, this article also seek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s of romantic love in Taiwan postmodern fiction, in which the pursuit of romantic love reveals the optimistic longing for social mobility. This explains why postmodern fiction, while cognizant of class division, often fails to critique this phenomeno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acro issue of history will be addressed.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the very type of postmodern aesthetics that emphasizes self-reflexivity and deconstruction also questions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s toward which socialist thought opens, thereby legitimiz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apitalism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verall, while the postmodern aesthetics in Taiwan fiction accurately identifies the economic character and class inequal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the postmodern genre still holds a certain conservative view that on one hand, structural inequity can be overcome through individual effort and, on the other, class inequality i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historical progress.

Keywords: Class consciousness, False consciousness, Marxism, Taiwan postmodern fiction,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一、從「階級意識」到「虛假意識」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中，現代社會的階級分化，不只是決定於客觀經濟地位的差距、或是生產工具的有無，所謂的「階級」，之所以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其實也聯繫於階級成員的主觀認同，也就是特定階級成員們，如何界定自身群體、如何理解自身在生產關係中的相對位置。正如歷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 1924-1993)所言，階級的形成，並不只是相似的物質條件或結構位置的人們的集合而已，任何一個能夠「利害與共」的階級集體，所不可或缺的是，「認知到彼此利害與共」這樣一個過程，通過這個「認知」的過程，特定的人群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凝聚力、有共同政治願景與實際集體行動的「階級」(2001)。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客觀物質條件外，特定階級的生活方式、文化、象徵以及語言，同樣是階級構成不可或缺的元素。這通向「階級」的主觀方面，也就是「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

按照社會學家賴特(Eric O. Wright)的看法，所謂「階級意識」必須能夠解釋，人們為什麼採取以階級利益為導向的集體行動、為什麼能夠辨認出自己所處身的特定社會關係。因此，當我們使用「階級意識」一詞，談及的就是，存在於個體心理層面，經過理性的推論之後，對於自身階級利益及身處的生產關係的認識狀態(1985: 243-244)。

正如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分析所揭示的：「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1972a: 693)——為什麼同質的法國農民只不過是「一袋馬鈴薯」，而不是完整的階級呢？根本而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現代社會大部分的人，都要轉化成出賣勞動力維生的勞動者，但是，如果廣大勞動者僅僅停留在個別的分立孤獨處境，那麼「出賣勞動的人」這一新的社會角色，就不會有結構上的意義。只有當多數勞動者有意識、有自覺地「消滅工人間的競爭」、「在共同的思想下聯合起來」，這時候才能夠形成「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並真正成為改變生產結構的力量(Marx 2009a: 654)。

那麼當代臺灣社會裡，一般大眾的階級自覺又是如何呢？以1994年中研

院所做的臺灣社會調查為例，有超過四成的勞工階級，認為自己已經側身中產階級（吳乃德 1994：134）。這一現象顯示客觀的階級分布與主觀的階級認定，常常有著顯著的不一致。那為什麼從屬階級常常沒有辦法辨認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屈從位置呢？正如上述調查所反映的，這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中另外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對於在整個社會中只占少數的統治階級而言，如果要讓大多數的從屬階級維持並且服從現有的不平等狀況，除了武力鎮壓或是經濟資源的壟斷之外，還需要灌輸一種對於現狀的認可，並且將這種認可擴展為社會整體的共識。

因此，對統治階級來說，如果「虛假意識」能夠全面性地擴展，其統治便能鞏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認為，資本主義絕不只是經濟層面的統治，更在意識與思想的層次運作，並且據此馴化那些在現有分配架構中並未得到公平待遇的大多數成員（Lukács 1989a）。換句話說，「主導意識形態必須能夠有效地處理從屬階級已有的經驗；而且，這些從屬階級體驗他們的世界的方式，將會受到主導意識形態的塑形與影響」（Eagleton 2006: 177）——正是因為受統治的多數人，接受了對統治者有利的道德、宗教、哲學等等各種觀念，並採用這些「主導意識形態」來理解自己的生活經驗（尤其是在資本社會中的困難與挫折），所以，被統治者們常常不能正確、適當地認識到自己在整體社會關係中遭受了歧視或剝奪，從而也不會去質疑統治階級的合法性。換句話說，當被統治者將統治階級的利益，曲解為自身的利益的時候，那些現有的不公正社會關係，就能夠得到穩固、甚至是透過此認知結構，而再生產更為加劇的不平等與不正義。

上述的這種「精神支配」，其實也是馬克思對階級關係的核心思維：「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2009b: 550），相較於統治集團而言，被統治者因為缺乏文化性的工具或手段、也缺乏資源去製作代表被統治者自身利益的詞彙與概念，故而，常常只能屈從統治者所加諸的主導意識形態。在左翼思想傳統中，無論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所言的「虛假意識」，或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或者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強調的「誤識」（misrecognition），其實都重疊於馬克思關注的「精神支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無法察覺資本家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這一真正祕密。換句話

說，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所要遮蔽的，即是「觀察者所察覺不到的表面上掩蓋著的真正動力」(Lukács 1989a: 73)。這能夠幫助我們去解釋，為何在數量上占壓倒性多數的被統治者，要麼被動遵守既有的秩序，要麼積極地信仰那些有利於極少數掌權者的世界觀、道德價值、政治信念。

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思考當代臺灣小說的階級問題，一個很適切的例證是張大春發表於1987年的〈四喜憂國〉。該小說微妙地展現出，普通人對經濟階層、對自身階級處境的（錯誤）「認知」——其中尤其能夠看出，在日漸資本主義化、所謂「臺灣奇蹟」這一經濟發展背後，深深捲入市場關係的升斗小民們，如何因為對於「政治」領域持有的強烈而過剩的意識，從而掩蔽了對於「經濟」生活內的統治關係的知覺（可以說這篇小說描述了某種隱藏經濟現實的「虛假意識」）。

〈四喜憂國〉描述的是一位年少時隨著國民政府來臺、在清潔隊工作的老兵朱四喜，他那荒誕的小人物生命史。張大春用戲謔口吻描述了朱四喜居住的眷村，例如，四喜的妻子古蘭花其實是從偏遠的原住民山村購買而來，「要不是朱四喜強把古蘭花薙光了半邊頭髮、拿鞋帶子綁在竹床上硬搞了那麼幾回，恐怕來福根本不會出生呢。」(1988a: 128)而最受朱四喜敬重的朋友，曾在大陸受過師範教育的低階軍官楊人龍，儘管他經常一本正經地宣講報紙社論及反攻大業，但楊人龍卻不幸在一次自瀆時猝死。這位性情嚴肅的軍官過世時，「滿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雜誌就扔在他的腰旁，而他那一雙經常指畫著牆板間報紙的手則緊緊握著一根粗大直挺的扁棒子」(1988a: 129)。

儘管〈四喜憂國〉有意而為地嘻笑怒罵，但讀者在莞爾一笑之時，也能夠看到兩種戰後臺灣社會的相對底層——其一是無力購買女性的楊人龍，結局是孤獨地在床上「跑馬」而死，在此典型地代表了幾乎無力娶妻成家的外省老兵族群；而朱四喜那並不經過羅曼史得來的年輕妻子古蘭花，更是被當作生育與性的商品，半強迫性的婚姻使她們從赤貧的原住民山村輾轉至臺北都會，以進行親密關係、家務以及生殖的勞動。

然而，隨著臺灣社會的工業化，即使是處在金字塔下層的朱四喜與古蘭花，他們物質生活也開始改善：「眼下過的還不錯哪，到年底我打算買他一架電視機……這在從前可是想都不敢想。」(1988a: 134)只是，稍微開始富裕起來的朱四喜仍然陷入了某種道德上的焦慮：「一天比一天有錢，買東西也很方便，買電視也買得起了，可是，要知道，光是有錢、榮耀主還是不夠

的，因為有了錢大家還會亂來，上酒家啦、跳舞啦、玩女人啦。」(1988a: 144)對朱四喜而言，即使有了電視電鍋，但大眾媒體上卻不再有老總統的文告，這似乎使得他感覺到難以忽視的空虛——換句話說，統治者對於新的經濟現實，並沒有提出另外一種成功的「虛假意識」，用以說服廣大的人民，接受新的經濟結構與新的物質利益分配。¹如果用葛蘭西的話來說，任何成功的政治權力，都必須創造一種與社會結構相應的上層建築，以積極誘使人民「同意」(consent)現存的統治關係。我們由此來思考朱四喜感受到的「空虛」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稍微開始富裕起來的外省老兵們，儘管他們覺得世界似乎因為資本主義而與以前有點「不一樣」了，但是他們卻沒有從國家、從資本家、從統治者那邊，接受到更新過後、能夠解釋這種「不一樣」的意識形態。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富裕」的臺灣社會讓朱四喜隱約感到某些不對勁的時刻，他再度夢見了死去的老友楊人龍。在夢中，楊人龍譴責「報上盡登些男盜女娼的玩意兒，也沒有人明白國家處境的艱難了」(1988a: 141)，並要求朱多讀、多寫反攻大陸的文告。在故事結束時，朱四喜將自己寫的「文告」影印了數千份，在街頭巷尾到處分發。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夢中出現的楊人龍陰魂，要求不識之無、粗魯無文的四喜勉力寫下「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然而，朱四喜寫下的這篇擬蔣介石文體的「告同胞書」，卻有些離題地，一再提及了「有了錢大家會亂來」這一道德勸誡。其實，在快速現代化的臺灣社會裡，隱隱感到難以適應的朱四喜，真正憂慮的對象根本不是空洞的復國大業，而是他偶然發現的，關於自身婚姻之裂縫：

(朱四喜)卻在雜院門口撞見一個正在和古蘭花打情罵俏的小夥子。那人穿一襲皮風衣，翻起了領子坐在路邊的法國椅上抖腿。古蘭花和來福正在洗他那輛純白色的豪華大轎車。那人忽地傾前上身，直勾勾地望著古蘭花低敞的領口裡的一雙大奶子，說『頭家娘好福氣！這少年，囡仔籠飼到這啲大漢啊啦。』他說著，眼中彷彿要噴出火來。古蘭花則陪笑道：『苦命人嘅，說什麼福氣。』朱四喜明明看見她答話當時眉又聳、眼又瞟的喜俏神情，直恨不得奔上前去踹她一個馬趴。(1988a: 137)

1 一般認為，〈四喜憂國〉所要諷刺的是「反共神話」的破產(陳芳明 2011: 670)，然而，「破產」的其實不只是黨國體制，就本文觀點來看，即使朱四喜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變得「較為富裕」，但他仍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體驗到了強烈的不安全感與焦慮。由此看來，〈四喜憂國〉其實也是對於「經濟奇蹟」這一「神話」的揭露。

仔細閱讀這篇小說就能發現，朱四喜真正的煩惱絕非蔣總統逝去後的「道德淪喪」，相反地，他所害怕的，是臺灣社會邁入在資本主義的全新階段之時，穿皮風衣、開大轎車的新興富裕階級，可能對於他的年輕美麗妻子所產生的那種附著於昂貴奢侈品的魅惑（儘管那恐懼是來自男性沙文主義的自卑自大）。換句話說，也許物質生活的總量改善了，但在朱四喜所生活的底層社會裡，從上層階級處感知到的相對剝奪感，也更為加重，這自然意味著在經濟起飛後的臺灣社會，階級關係已經更加尖銳。所以，這位老榮民總是惴惴不安地，「瞥眼瞧了瞧牆版上那些個新聞：『仇殺』、『情夫』、『紅杏』、『戀姦情熱』、『老夫少妻的悲劇』」（1988a: 139），他在「有錢人」那裡感受到的壓力，就直接反射在朱四喜對於自身婚姻的多疑和心虛當中。

在小說中，儘管臺灣社會已經從黨國威權體制慢慢轉變為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但是，朱四喜的「語言」還留在黨國時代。他甚至嘗試將與資本社會脫節的「忠黨愛國」論述，灌輸給他輕微智能障礙的長子（因為其他兒子們，多能夠從學校和同儕接受「社會現實」，不把老父的信仰當一回事）。如果對於〈四喜憂國〉做個馬克思式的摘要，會是：當臺灣進入新一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朱四喜恍惚、含糊地感覺，自己在精神上所依賴的過時「上層建築」，在新時代的沖刷下逐漸崩解。

當朱四喜對於階級關係的察覺，已經斷裂於實際生產關係、不符合新的權力分配模式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朱四喜擁有的是一種對於階級處境的「有限的知識」——他發現了事情不太對勁，並且口齒不清地嘗試表達。儘管，受限於黨國教條語彙，他誤以為「文告」是矯正人心的良方（對照起來，朱的「文告」也可以視為某種《狂人日記》，其實朱四喜跟「醒悟禮教吃人」的「狂人」一樣，是一位「醒悟資本主義吃人」的先知）。

儘管朱四喜試圖從文告這一「政治宣言」文體，來否認或是掩蓋使他感到不安的「階級分化」現象，不過現代資本主義中日益加劇的經濟分層，已經深深擾動老兵的政治潛意識。這一狀況在1990年代以後的臺灣社會，更加得到了體現。正如社會學家觀察的，即使臺灣因為高度工業化而刺激社會流動，但是從社會階級的相對關係來看，體力階級與非體力階級之間的區隔仍然明顯(Tsay 1997: 48)。

不過，即使人類社會裡客觀地存在分配經濟資源的階級結構，但人類畢竟是意義與語言的生物，我們還是必須「理解」、「認知」外在

的經濟結構，並且因為理解與認知而促成的階級團結，才能進行結構的變革。說起來，朱四喜的故事，正是階級議程在本土脈絡中典型的「反例」，該篇說明了當代臺灣的某種弔詭：一方面是越發穩固的資本主義經濟與階級結構，以及在此同時，人們對此結構一知半解、缺乏認識。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當被統治者缺乏對於自身經濟處境的正確理解，那麼「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便不能夠轉變為「自為階級」。

如果我們要對於當代小說美學進行一種文化性格的分析，那麼，就必須將焦點集中在小說文本中的這種「對於階級關係的自覺」，也就是某種「階級意識」上面。這裡可以回到湯普森的著名定義：「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是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的某種東西」(2001: 1)，換句話說，日常生活的方式、大眾的一般性情感、表述勞動與分配過程的語詞與概念、對階級同伴的同情共感（或是對階級他者的憤怒與仇恨），就會是如本文這樣的文學研究，特別能夠去考察的對象（畢竟文學文本中，也不能直接找到客觀的社會階級狀態）。同時這也表示，本文接受的是修正過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一如所有其他權力結構）「階級」這一主體，必須同時是文化的、有著思想與生活方式的獨立起源，而不只是某種經濟結構下的必然衍生物。

在這樣的觀點下，恐怕必須同意，在當代臺灣社會，我們很難把「階級」概念視為解釋本土社會變遷的範疇。原因無它，相對於西歐社會，在臺灣快速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中，一直都缺少階級性格的庶民文化。那種足以被稱為「文化」的東西，總是需要時間的醞釀與傳播、需要在漫長歷史中發展為大眾的共識（就如湯普森筆下那源遠流長的英國工人生活）。就此而言，臺灣社會的主要從屬階級（無論是農工階級或都市受薪階級），似乎並沒有發展出一種能夠界說自身、刺激團結的整體生活方式。

因此，在臺灣的當代小說中，是否自覺地去認知階級結構、或是無意識地反映出階級關係，這將是需要釐清的問題。接下來，我將以當代臺灣的後現代小說時期的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²思考這些文本中對於「階級」這一社會

2 由於本文的首要關懷是當代臺灣小說與後現代美學中的「階級意識」，因此，在文本選擇方面，雖然盡量採用具有「後現代主義技巧」的當代小說，但是為了清楚論證當代小說中的「階級意識」，也會稍微旁及一些可能並不完全歸類於「臺灣後現代小說」、但卻具有引人深思的階級意識之表現的作品，例如後面討論的郭華（倫

現實所持有的認知與詮釋。我們應能同意，所謂「臺灣後現代主義文學」可說是解嚴後相當重要的文化現象，一方面表現了臺灣社會在資本主義成熟階段所伴隨的思想與價值轉變，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所揭櫫之懷疑論的、去中心的、反對宏大敘事的美學姿態，又直接成為臺灣島內的認同政治所依賴的重要工具。當臺灣的小說家們依賴後現代美學、拼貼技巧以及後設手法，試圖去「解構」宏大敘事與線性歷史的時候，其實就與馬克斯主義「虛假意識」主題有著某種諷刺的親緣性——馬克思主義意圖「揭露」統治階級施加於思想與道德等層面的統治；而後現代主義則試圖「揭露」任何「解放政治」(politics of emancipation)本身所具有的專制性格。儘管我們還是能夠設想，馬克思主義者對上述指控的回答會是：後現代對於宏大敘事的拒絕，其實未必是認知上的解放，因為那種過分強調「微觀與個體」的後現代觀點，尤其服務於資本主義的統治技術。要考慮到，既然後現代主義總是強調碎片化與個人化的美學、強調欲望和幻想、強調娛樂本身的政治學，那麼，這種強調也很容易通向個體在消費市場中，不可或缺的購買欲和商品邏輯(Harvey 2003: 86)。

在我看來，臺灣文學的「後現代狀況」，多多少少坐實了上述懷疑。不可否認的是，對羅青、林耀德這些臺灣後現代的早期提倡者而言，「後現代狀況」往往歸因於簡單經濟因素，如「強大的複製力」、「迅速的傳播方式」、「商業消費導向」、「生產力大增」。這一類的歷史診斷主要因為「資本主義」欣欣向榮而額手稱慶。假如我們直接從本土的後現代美學實踐來看，臺灣後現代小說的許多代表性作品，常常迷戀於萬象紛呈的商品拜物教，或者是資本主義帶來的那種立足於富裕中產階級身分之上、棲居於消費者個體尺度之下的，非常有限之自由。然而，也正是在此——也就是臺灣後現代主義小說中一再出現的，關於消費、欲望，還有萬花筒一般的都市生活主題——能夠提供我們思考「階級意識」的一個值得深入的切入點。接下來，在第二部分，我將討論後現代小說美學中對於生活風格與符號展演的迷戀，是如何關聯於中產階級的階級氣質；而在第三部分，則是思索教育過程與階級再生產的機制；在第四部分，將要分析後現代文類中的「愛情敘事」，以及該愛情敘事所隱含的、對於階級流動的樂觀信念；在第五部分，

心賊》、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等。此外，還有一點要稍微說明：由於本文主要的目標，是對於臺灣後現代美學的小說文本進行意識形態與政治觀點的分析，因此，在文學史背景、作者創作脈絡等方面較少著墨。儘管這種省略是為了使論證聚焦，但是本文在歷史細節方面，確實是比較粗疏的。

則是討論後現代美學之中，對於「當代臺灣史」的想像，在其中，資本主義常常與社會進步無從區別，批判的階級意識則是黯然缺席。

二、著迷於「生活品味」：後現代美學與中產階級文類

臺灣的後現代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題材是，在「市場」這一奇妙的資訊烏托邦，各種使人目眩神迷、心旌搖盪的消費體驗。這一主題構成了臺灣後現代文學中鮮明的都會景觀。我們馬上能想起朱天心的〈第凡內早餐〉。敘事者是一位大學時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上班族女性，然而，十年的職場浮沉，幾次速食愛情，令三十歲的她發現自己毫無寄託，且每每在情人節前夕因為單身而落寞心虛。主角相當清楚自己在經濟上的從屬地位：「出租自己的勞動，就是開始自己的奴隸生活——我做女奴，已經有九年了」，最後這位女奴決定，將自己三分之二的薪資所得，拿去換取一顆名為「南方之星」的鑽石，並且「以情人的款款深情之姿緩緩套在左手無名指上，心中漲滿了寧靜的快樂」（1997: 108）。

有些相似地，則是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主角是一位美麗的模特兒米亞，儘管年輕時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戀愛，但是米亞這個世故的老靈魂，卻對家庭或婚姻什麼的毫無興趣。對她而言，唯一穩固的事物只有身體與時尚，「物質女郎，為什麼不呢，拜物、拜金，青春綺貌，她好崇拜自己姣好的身體」（1992: 179）。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沉醉於消費的米亞的視野中，那些購買得來的「物」，它們的勞動本質被遮蔽了，現在被叫做「商品」的「物」，也就是人類勞動的產品，被神祕、獨斷地歸於謎霧重重的市場領域：

勞動的社會性質以歪曲的形式「表現」為物的「屬性」；社會關係表現為物（產品、使用價值、商品）互相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位拜物教徒把這個假象看成為真實的東西，並且事實上相信物的交換價值是由他們做為物的屬性來決定。（Marx 1976: 139）

由是，米亞既不能理解香水或衣料的價值來自於生產者投注的勞動，也不能理解「勞動」本來應該對於實在的社會關係負責（這就是為什麼米亞同時拒絕工作與婚姻），相反的，商品所立足的那個將須彌藏於芥子的「虛幻世界」，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感官經驗，還有僅僅依靠「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朱天文1992：179）的自我。

於是，我們能看到，對於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他們的身分認同並不來源於階級緊張催生的革命意識或政治團結，相反地，在〈第凡內早餐〉、〈世紀末的華麗〉裡的青年都會女性，他們卻深深浸染於市場機制提供給中產階級的商業編碼，熱衷於生活機遇、品味、時尚的共同感受。這種對於消費的沉溺，經由購買欲所過濾的經濟屬性，其實偏離了馬克思意義下的「階級」，而讓我們想起了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談及的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韋伯指的是一種由特殊社群的內部所共享的「市場」屬性，並且透過分享這一屬性，這使得該社群與他人區別開來：

(1)很多人有一種特殊的、關於生活機會的因果構成，而且是在這樣的限度內；(2)這種構成只是在佔有財產和收入機會的經濟利益中表現出來。同時(3)這種構成出現於商品市場或勞務市場的條件之下。這就是「階級處境」。(2007: 1006)

我們還能在布爾迪厄那裡看到類似的觀點，所謂階級，就是那些同樣生存條件下的特定行動者，因為相同的生存條件對於這些行動者的制約，因此他們擁有相似的秉性(dispositions)以及由此秉性所衍生出的趨同行為模式(1984: 101)。

如此說來，講究挑剔生活品質的女奴與米亞，就是無比堅貞的戰友，她們的共通之處尤其在財產類型和消費行為中體現，這些中產階級確實深刻理解了「品味」的階級意義。然而，當她們順服於消費生活中的「品味」的同時，也是對於現有階級關係的文化投誠。此刻，她們「正確」辨識出自己的經濟屬性，但又「不正確」地給予此一經濟關係合法性。從韋伯傳統來說，這種共有的階級狀況便組成該階級成員的「大眾行為」(Weber 2007: 1066)。

但僅僅是「階級意義上的共通行為」還不夠，我們應該要追問，當代文學的讀者，是否也多少從後現代美學再現形式中，取得關聯於自身階級身分的共鳴呢？社會學家葉啟政注意到，在199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在經濟結構與意識形態兩方面之深化，中產階級的文化品味很快地取得了象徵權力，與此同時，中下的藍領階層也渴望晉身中產階級、或是因自身成功上升為中產階級為榮(1991: 122-123)。

在〈第凡內早餐〉與〈世紀末的華麗〉這樣的作品中，都會年輕女性著迷於購物生活這一主題，確實就根源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分層。³對於女

3 例如張誦聖認為，當年在報紙副刊上大受歡迎的閨秀文學與女性文類，其實是迎合了新興中產階級的審美偏好(Chang 2004: 112)。

奴與米亞來說，躋身消費新貴，偽裝或是拒絕自己其實並不只是薪資勞動下的「工人」，那其實對於自我認同起著虛榮而強大的力量。由商業化與都市生活所助長的中產階級文化，其炫富、展示、象徵的性質，遠遠要勝過思想上的深入與自覺，並且「麻痺了人們從事反省批判的能力。……使得『中產階層』有的只是『感覺品味』(taste of sense)而無所謂的『反省品味』(taste of reflection)」(葉啓政 1991: 124)。這種耽溺於表層的、關乎符號自身、訴求於交流而非反思的「品味」，其實關聯於臺灣後現代文學的其中一個重要形式特徵，也就是「符號」上的炫示或表演。

這種對「語言」、「符號」的強烈關注，基本上是臺灣後現代文學尤其著迷的核心。學者們對於臺灣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形式描述大都環繞於此，例如：蔡源煌說後現代小說「對於語言、文學形式以及對小說書寫的充分自覺……因此，強調現實亦經由人爲詮釋而定，其性質與虛構無異」(1990: 192)，或者陳芳明認為臺灣後現代文學「極力擺脫語言本身既有的意義，逐漸把文字當作符號來遊戲」(2011: 654)。在我們剛才討論的〈第凡內早餐〉與〈世紀末的華麗〉，其後現代主義品質就強烈地關聯於（特定階級生活中才懂的）「訊息」的操縱，如對時尚品牌的細瑣知識、剪裁式樣質地產地設計師八卦諸如此類。

對於負載著巨大訊息流的「語言」方面的關注，也可以見諸張啓疆發表於1995年的〈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該篇小說中，其後現代戲法同樣集中在對於（負載各式各樣資訊或意義的）語言的過度嫻熟，並且，這種過度嫻熟的目的在於，揭發關於「婚姻」、「愛情」這一崇高信念背後的平凡卑瑣。儘管這一故事其實還有一個明顯的勞動主題：也就是任職於廣告公司的主角，與自己的智力勞動之間的異化。不過，在此我們首先集中去思考，敘事者那雅痞又有才思的、調情般的口吻。毫不使人意外的，〈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重複了臺灣後現代文學的主旨，即「語言文字的高度虛妄」。我摘錄一段小說中的描寫：

你凝視著漩渦底部的空虛，一隻手碰著信紙順著念、到著看，或從紙背透視正面。你不是再讀信，而是無視於信文，變成目擊、聆聽、觸摸、品嚐……文字突然蛻為模糊的點陣、色塊與圓渦，意義消失了、訊息混淆了。(1996: 37)

該篇小說中，這一類機智的、犬儒的有意含糊，以及混合了文學名家與八卦小報的旁徵博引，使讀者感到目不暇給。儘管在不同作家身上或有風格

差異，但是風行一時的後現代思潮，給不少運用此技法的臺灣小說家的共通影響就是，在展示了關於作品主題的淵博資訊後，又很快地捨棄這些知識所欲傳遞的信實（這篇故事亦然，這位步入中年的偷吃出軌高手，居然被一封完全沒有確切收信者的廣告性質情書，撩撥到不能自己）。

當然，意圖解裂各類典型文本與核心意義的後現代文類，依賴的是「符號」層次的政治：真正且唯一的現實就是，能夠天衣無縫編織謊言的語言文字。黃錦樹就認為，極度偏愛語言面向的臺灣後現代主義，其美學上的品味同時混合了傳統文人情調與都市布爾喬亞之浪漫(1996: 268)。這種對「符號」的強調，其實能讓我們思考本土後現代文學的兩個重要背景：(1)後現代文類的作者與讀者共享了對於資訊與知識的高度樂觀。說起來，臺灣後現代小說中那種樂觀的語言中心主義，其實就聯繫於一種看重「資訊」的學養。如同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所觀察到的，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專業白領人士越發重要，並成為中產階級的核心組成(1989)。(2)此外，後現代小說中慣有的那種博學的腔調，不只是因為白領階級文化更重視專業，恐怕還包含了某種（透過展示「擁有文化」所造成）社會區隔與優越感。這種透過「有無文化」來區隔社會階層的一個例證是，張大春對於朱天心那種，百科全書般、對於無知讀者極不友善的寫作姿態之評論：「朱天心傾心於『人類偉大心靈長期所產生的種種』，已然極其明顯地暴露出一種不惜與不明白典故出處的讀者決裂的態度」(1992: 13)。⁴其實，張大春之所以觀察到這一部分，多半是因為他自己就是當代臺灣文壇中，尤其大張旗鼓針對所謂「不明白典故出處的讀者」最為尖銳的作者（我們這些學院養成的、偏愛純文學的「菁英」讀者，大概都很難忘記張大春在文體跨界還有後設實驗技巧上挑釁般的探索）。如果我們深入思考前面提及的葉啟政的觀點，以此來看待後現代文學對於語言符號的熱衷，也許就顯露了該文類在社會與文化階層上強烈的敵我觀點：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文化是「展示性質」的、目的在於標榜自身在象徵位階上的優越——這似乎很能解釋後現代文學那高蹈的菁英姿態（甚至還要勝過更早的現代主義）。或者這樣說，充滿機鋒的臺灣後現代文學，自身就是90年代逐漸

4 在原文脈絡中，張大春強調的是，邁入中年的朱天心之所以採用如此厚重的寫作方式，其實是對於「無憂無慮」、「缺乏記憶」的年輕新世代的拒絕。然而我覺得與其用「世代」來理解張大春的詮釋，不如用「社會階層」來得更加深刻。朱天心蓄意採用的，充滿典故或是回憶的行文姿態，其實是無意識地反映了文學知識分子們更為偏愛中產階級讀者。

清晰浮現的白領中產階級，用以進行社會區隔或是象徵位階爭奪的有力工具。

這裡且讓我們暫時回到臺灣文學史的脈絡，來思考後現代主義擁護者對於鄉土文學傳統裡寫實主義的敵意。如果菁英色彩強烈的新興後現代文類真的發揮了某種「社會區隔」的功能，⁵那麼，也許就能夠解釋在臺灣文學從鄉土文學到後現代主義這段時期，後來居上的「後現代」之所以對於原本占據主流文學典範的寫實主義如此窮追猛打的結構因素：後現代主義文學代理的是都市中產階級持有的美學品味，而鄉土寫實文學在政治上代言的則是沒落中的農工階級，它們根本上的扞格不只在於美學與哲學，實則重疊於兩者在階級位置上的矛盾。

果真如此，那麼這些後現代主義作品中，儘管不是那麼直接，但是仍有著一種關於階級身分的自覺：對寫實主義宣戰的後現代主義文類，真正參與的是爭奪文化資本、象徵權力的社會等級競賽。這意味著在這一歷史時期中，成熟意義上的臺灣中產階級終於興起，故而有著奪取文化權威的強烈企圖。

三、傳遞文化資本：臺灣後現代小說中的階級教養

如前所言，作為經濟位置之表達手段，「後現代文類」當然可以看作是都市中產階級對於自身的一種「認知」與「區隔」的方式。「後現代文類」要如何界定「我們中產階級」呢？張大春於1996年出版的《野孩子》，是一個在「街上」「出來混」的故事，也是一個自覺反省階級意識的文本。當該書的主角「大頭春」從白領階級「墮落」至社會底層，這樣的「冒險」便很清楚地勾勒了臺灣社會中兩種大異其趣的「階級文化」。故事大綱是這樣：家境富裕的13歲少年大頭春，陰錯陽差加入了以流氓許叔、阻街女郎阿妮為首的，不怎麼窮兇極惡的暴力討債集團，同時也見證了許叔與大黑道「氓哥」的爭鬥。比較其他大部分著重於描寫都市中上階層的後現代小說，《野孩子》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從無法適應教育體系的逃家少年的角度，反

5 我們自然不該把「社會」當作是有某種「需要」、或是懂得去「欲求」的某種神祕的東西，故而當這裡說後現代文類能夠滿足特定社會群體的「需求」時，似乎落入了「功能主義」的陷阱當中。不過，在此我得承認，這種功能主義解釋，好像能夠比較通俗地去說明中產階級試圖「提升」自身在文化上的象徵地位的過程。

襯出「中產階級」獨有的道德、氣質、精神與身體規訓，或者說乾脆說是中產階級的「慣習」(habitus)——個體從社會結構中取得的、能夠幫助個體去適應或是再生產該結構的，那些非反思的身體性實踐——的再生產過程。

小說中，大頭春那位開設廣告公司並事業有成的女強人母親，爲了尋找「失蹤」的兒子，製作了一則廣告。收容大頭春的阻街女郎阿妮看到這則廣告後，便勸大頭春應當回到母親身邊：

「你不應該像我們這麼沒用的。」阿妮說：「看報紙上那麼寫，我想我們大家都羨慕你的你知道嘛？」

「算了！我還羨慕你咧。」

「我？你羨慕我？我有甚麼好羨慕的？」

「你會開大吊車。」(1996: 80)

雖然大頭春稍微動搖了一下，但小說也暗示，大頭春並不真的相信媽媽在「廣告」裡說的洋溢思念的言語。探究大頭春之所以離家出走，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大頭春在學校「不服管教、毆打師長」（大頭春與教育體系非常不融洽）；另一個更深刻的理由則是，作爲一個頑皮又不聽話的孩子，大頭春與中產階級家庭內部的「協作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此一管教方式，有著嚴重摩擦。相對於工人階級對於下一代採取的自由放任、不在技能與學業上多加干涉的態度，所謂「協作培養」是指，爲了灌輸與培養孩子能夠在未來擁有重要謀生優勢的文化資本，中產階級家長通常對於子女的教養，保持高度的監控與縝密的規劃，並且隨時準備爲了孩子的長遠利益，而介入他的學習生活(Lareau 2010)。我們在大頭春回憶父母親的段落中可以看到，大頭春的母親嚴厲地將力爭上游、追求成就、競爭與自我激勵的學習態度灌輸給大頭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故事中大頭春那個散漫的父親，也是因爲難以接受此種嚴厲而和大頭春媽媽離婚。

在前面引文中，大頭春表示羨慕阿妮「會開大吊車」，雖然引起阿妮的嗤笑，但卻真誠地表達了中產階級與「在街上混」的社會底層之間巨大的文化反差。身爲「階級教養」的瑕疵品，大頭春這個畸零的孩子並沒有成功地被階級再生產機制給整合，從天賦上而言，他更加親近於在阿妮經營的廢車場中，駕駛起重機具、拆卸報廢汽車，那種以身爲度的技能類型。這與證書文憑爲取向的學校知識，在性質上大異其趣。大頭春在廢車場工作所必須具有的此一身體性的、實踐的知識，也更接近勞工階級以動手做爲傲、強調男

子氣概、強調「解決問題」的氣質。⁶

與大頭春遭遇相似的則是混混小馬，雖然身為富裕的醫生獨子，然而小馬天生不能辨識任何數字，無法在學校取得好成績，自然無法繼承父親衣鉢，導致親子關係極為緊張。在小說結尾，小馬與大頭春兩人開著一輛偷來的貨車，將小馬父親的醫院大門撞個稀巴爛，渾身是血地坐在駕駛座上哈哈大笑。在臺灣的後現代小說中，選擇以「衝突」而非妥協作為結尾的處理方式並不多見，在《野孩子》裡，青春期的難以馴服的躁動不安，一方面質疑了在「乖孩子」背後狹窄而暴力的學校教育本質，另一方面，也描述了知性的文學讀者們很難熟悉的「階級他者」，那些生活在街頭的下層小人物的生活經驗。作為一本帶著解構中產讀者的反啓蒙小說，《野孩子》在篇幅上的短小匆促，其實相當可惜。

在《野孩子》裡所嘗試描寫的「階級位置的文化再生產」，或者說，中產階級「主體養成」之過程，其實是帶著質疑與反省的味道。然而，在其他同樣處理中產階級特質的作品裡，則是常常表現出對既有社會結構的接納。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就是一個值得與《野孩子》對照的反例。本書是由刊載於中時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集結而成，原本就不是一個結構緊密的長篇，而是由兩個主要角色碎片般的愛情之旅所構成。該書情節聳動、語言調侃戲謔，而且，主要人物的過往與內在也不甚連貫（敘事者「我」對往事的回憶常常前後矛盾，一下子是純情處男、一下子是情場老將）。基本上，《蛋白質女孩》游離於「純文學」的邊界，具有相當的通俗色彩。也許該書的「後現代」特色並不同於張大春、朱氏姐妹那種強烈理論意識的學院後現代，但其明顯的大眾性格，則更貼近臺灣的商業文化。

在這本「中年都會男子要如何在狂蜂浪蝶與世故熟女之中尋找真愛（或砲友）」的戀愛指南裡，其實有好幾次都提及了「中產階級的世界如何可能？」這樣一個恐怕極容易引起該書的標準讀者共鳴的問題。細看《蛋白質女孩》對往事的回憶、對未來的展望，這本書同樣對階級社會提出觀察：人們需要通過那些訓練才能「進入」中產階級？（前面討論的《野孩子》處理了幾乎同樣的問題，然而，其描述的是階級身分的「斷裂」而非「延續」。）

6 這種與身體勞動密切相關的男子氣概，其實也可說是某種誘因，促使那些認可陽剛氣質的勞工階級青少年，反而更願意投入資本主義分類中較低階的身體勞動(Willis 1981: 148-151)。

例如在小說中，當「我」勸阻好友張寶與大學女生戀愛時，張寶訴說了自己的鬱悶：「從小，我們被教著要按步驟、守規矩。情竇初開時，他們要我們考上建中再想女生。考上建中後，他們要我們進入臺大再覓佳人。然後是先留學、先拿Ph.D.、先找工作、先昇上經理」（2000: 35）；而後又一次的，「我」爲了反對張寶不明智的辦公室戀情，再度強調了「步驟跟規矩」的重要性：「沒有這些規矩，中產階級的社會如何建立？」（2000: 88）——「我」很清楚，當個會唸書的乖小孩，與自己所依附的經濟結構中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確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教育的本質，一方面是生產出標準化的、勤勉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既有符號權力的灌輸與複製(Bowles and Gintis 1989: 145-170)，因此，在「我」與「張寶」的回憶中，他們年輕時所接受的自制嚴謹的菁英教育，直接保證了他們如今在職場中所擁有的一點點差強人意的「成就」。此外，小說中不厭其煩地提及主角所經歷的建中、臺大、美國MBA生涯，其實也是中產階級經歷的、由名校和文憑雪球所滾起的文化資本累積路徑。不言而喻的是，在過往求學生涯中每每使主角們厭煩悔恨的「不交女友」、「守規矩」，自然也是中產階級關於節制與禁欲的美德。

儘管《蛋白質女孩》可以算是一部誠實地歌頌物質享樂與情愛遊戲的作品，恰好與馬克思主義要求的政治進步徹底背道而馳，但是這裡我想要強調：透過對於東區夜生活以及企業文化的把玩，透過對於「似曾相似求學過程」的回憶，這個商業化的文本仍然有著很強的「階級性」。

該文本的「階級性」還體現在一個方面，也就是這些循規蹈矩又欲求不滿的中產階級，對於上層統治者的看法。在「我」追求蛋白質女孩們的過程中，遭遇了一位與自己根本不在同一量級的對手，所謂「雷射頭」先生。這傢伙不但英俊瀟灑、大學時還是名校橄欖球隊的明星四分衛。但這些外在條件都比不上「他是哈佛商學院的MBA，一家跨國銀行的總經理」。事實上，「雷射頭」之階級位置，是相當靠近資本家的「高級經理人」，而在故事中，「我」對於這樣的高級經理人完全沒有發展出任何結構性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自慚形穢。可以說，整本小說都在處理在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其中一個信念來源：爲了「把到」最高品質的女人，我們得要更加有錢、更加成功。在此文本裡，我們又能夠看到韋伯觀點下的那種階級式思考，角色們對於「生活機遇」的反思，確實構成了某種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基礎：正是由於「我」和張寶生活在一個香車名酒與高級服飾編織出來的物質之網中，但他們又自覺地體會到，偶爾享用富庶物質生活的自

己，還遠遠不是現代經濟的統治者，「我們在騙誰？像我們這種低等動物，高維修女子怎麼會看在眼裡？」（王文華 2000: 20）故事中的這段埋怨，也就是在說，爲了「得到優質女人」，我們這些中產階級只有更拼命地鑽進上層社會的窄門。

在我看來，《蛋白質女孩》背後的政治意識可以這樣翻譯：由於婚姻市場內在的零和性質——美麗的、體面的、有教養的女人，要嘛屬於別人，要嘛屬於我——這將使得這本小說的視角，無可避免地傾向於「認同」現有經濟結構中高階的受益者。這似乎也阻礙了某種政治團結，因爲對於上層階級的企羨，終究澆熄了反叛既有經濟現實與當下生活狀況的火種。我們在下面一節還會再次回到「中產階級如何辨識經濟等級」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之中。

四、拒絕階級矛盾：「愛情敘事」所憧憬的階級流動

在一篇討論「臺灣後現代主義」相當早期的文章中，羅青強調了臺灣社會的信息化、工業化的過程，用來說明臺灣的後現代文化的根源(1989: 12-13)。然而若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頗值得存疑，因爲後現代思想引入臺灣的初期，還屬於發展前期的臺灣社會，並不曾到達被高度組織起來的「晚期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但是這一解釋保有一種「非歷史的真知灼見」：作爲高度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臺灣後現代主義也許並不生長於當時還未成熟的「經濟基礎」之上，但是，在倫理的層面，臺灣後現代主義卻辯護了即將來臨的工商業社會與資訊社會的正當性，換言之，即是資本主義的正當性。

正如前文所述，雖然臺灣後現代小說表現出了中產階級對於自身隸屬之社會階層的自覺，並且也描述了當代階級社會中的等級關係、勞動經驗，然而，我們也得承認，臺灣後現代文學儘管在敘事技術上採取前衛的姿態，但是它們實質的政治旨趣卻趨於保守——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化之路途上的階級矛盾，仍然通往一定程度的和諧。譬如前面提到〈第凡內早餐〉，曾爲左傾知識分子的「我」，到頭來還是心甘情願讓高價的奢侈品，填補自己在勞動生活中脆弱而空白的社會關係；再不然，《蛋白質女孩》乾脆立地成佛、明心見性：一切痛苦都是因爲我還不夠有錢！存在於臺灣後現代小說中的，那種對階級秩序的非批判性的理解，起著合法化資本主義政權的作用。

與高度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牽扯不清的後現代思潮，其實很大程度要求我們去修正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馬克思的正統觀點通常帶著一種樂觀的目的論色彩，相信充滿剝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後終將導致全面階級革命，同時統治著人類生活的商品經濟也會跟著消滅(Engels 1995: 633)。然而，在晚期資本主義催生的後現代高潮中，我們並沒有發現，現有社會關係之矛盾足以促成全面的生產關係革命；相反地，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認清，無產階級革命一再挫敗，廣大工人群眾也不曾因為共同階級利益，而積極進行政治鬥爭(Callinicos 2007: 178)。換句話說，為了解釋人民大眾對資本主義政經制度的首肯、甚至嚮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葛蘭西所提出的根本性問題：統治階級所樹立的「文化霸權」是一種全面的宰制，它不只是制度面的暴力，同時更是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積極的「整合」(affiliation)、也是被統治者對於統治者心甘情願的「委任」(commitment)。換句話說，透過製造與操縱所謂的「集體意志」，統治階級滿足了人民大眾的「需求與欲望」，並且使得被統治的大多數人，心甘情願地將統治的權利交付給上層階級(Ives 2004: 68)。

現在當我們談及被統治者的「需求與欲望」，這就接近宰制的文化機制問題。在階級政治退位、總體性變革讓位於消費生活的當代，勞動階級之所以缺乏政治影響力，很大原因在於人們所「需求與欲望」的東西，並不是政治權力的提升（因為資本主義所支持的形式民主，在法律上，每個人已經是「平等」了），而是私人財富的累積。準此，勞動大眾自然不思反抗資本主義的聚斂規則，反而對其亦步亦趨。在此一基礎上，我們接著要繼續思考，那些透過臺灣後現代主義美學所表達的「需求與欲望」：此文類在很多時候表現了「中產階級」所企盼的終點，也就是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階級社會的人上人。

首先讓我們稍微回到前面提及的《蛋白質女孩》。雖然本書看起來像是主角「我」與好友張寶，在物化又異化的現代社會中尋找根本不可能的真愛的冒險，然而，本書其實也可以說是利用了性別化的視角，來觀察愛情市場的「叢林法則」——如何吃掉與降伏其實比男人還要精打細算的都會女性。這兩位疲憊的男性主角，最後對於「追求愛情」這檔子艱難的生意的結論是：「我突然開竅，決定明天上班要提早。可以考慮讀夜校，學一學最新的電腦技巧。我要培養專業素養，把我的身價提高。」(2000: 234)然而，仔細思索便可以知道，「我」其實根本沒有「開竅」，因為這種「提高」始終是「我」在這故事中不斷地回憶、貫穿了整個少年與青年的人生目標：「我們

一輩子在追求第一：考最好的學校、進最好的公司、拿最好的位置、搶最高的薪水」(2000: 124)。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教育與商務工作中的潛移默化，本來就強調競爭的邏輯，美嬌娘總是跟著功名財富而來。「我」最後嚴肅地思考了自己在戀愛中跌跌撞撞的過去：「追求心靈最後會身心俱疲，重視物質可以讓這一切比較容易」(2000: 256)。

還有一個場景能夠更赤裸地說明「我」的領悟中潛在的「階級意識」：有一段情節是，在國外念管理MBA、地位大概私人企業中階主管的兩位主角，張寶和「我」，偶然討論起為什麼每次參加聯誼都是女多男少：「你回想我們參加的這些派對，女性的職業很多樣，有女工、有總機、有經理、有醫師。有的在汐止的工廠作事、有的辦公室裡有自己的浴池。但男性的背景就很單純，他們一概是外商的中級經理，襯衫領子上有兩顆扣子。你從沒有在這種派對上遇到……好比說，當警衛的男士」(2000: 231)。

這其實不是《蛋白質女孩》一書第一次去反省整體「社會關係」，而且每一次，「我」看到的都是某種優勝劣敗：儘管「我」所苦苦追求的那些女孩們，都把外商經理當作是夢中情人，然而，正如張寶警告迷惘的「我」，「好比說當警衛的男士」這樣的藍領階層，甚至連進入愛情遊戲的門票都無從入手。讀者幾乎不需要什麼推理能力或是理論工具，就能夠解析該書中的（男性中心的）「階級意識」：女人這一「益品」(goods)，完全是正當合理地按照經濟地位進行分配，故而，力爭上游、或說是努力遵守資本主義比賽規則，就成了中產階級男性們唯一「理性的」選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級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

與2000年出版的《蛋白質女孩》相較，郭箏早年發表的短篇〈偷心賊〉，同樣地藉由「性別化」的視角，來描述臺灣社會的階級分層與可能存在之階級流動路徑。在這個一點點溫馨浪漫、又有一點點大男人主義的故事裡，儘管經濟地位將男女主角分隔，但是此敘事仍然允許「愛情」、或者說「心意相通的兩人（兩個階級）」是可能跨越鴻溝的。⁷〈偷心賊〉的故事是

7 可以粗糙地推論：跟《蛋白質女孩》裡面牢固嵌合於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當代臺灣比起來，〈偷心賊〉背景中還在經濟起飛早期的臺灣社會，人們物化的程度還沒有那麼深、還沒有那麼勢利，所以在擇偶問題上也還沒有那麼倒落狠心——雖然仔細閱讀就能看見，〈偷心賊〉這篇故事所調侃的東西，其實與《蛋白質女孩》相當相似，只是程度上不同。

這樣：一位高級電腦工程師發現自己的汽車不知道被誰開走了，當天晚上，他居然接到自己留在車上的行動電話所撥來的電話，並且因此與那位偷走汽車、平日打零工維生的年輕女太妹，發展出了一段微妙的愛情。

可以看到，小太妹雖然身處底層，但是她和男主角之間的通俗愛情劇碼，事實上導向了一種階級和解。作為現代性的一個具體而微的零件，在那時還是奢侈品的「行動電話」科技，居然為兩人各自的疏離境遇帶來了解放。這故事的詮釋可以更加溫柔：儘管階級確實存在，但不會是不可跨越的鴻溝，愛情便足以解決階級這個社會問題。

說起來，在臺灣當代小說中，階級矛盾這一現象常常因為（異性戀的、一對一的）愛情關係而得到緩和。例如李昂的《迷園》，主角朱影紅本是沒落的世家之女，而其用盡手段去誘惑與追求的對象林西庚，則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家。固然《迷園》裡男方的強勢姿態源於經濟上的優越，但是我們也看到，朱影紅家族失去的社會地位，最終透過戀愛「失而復得」。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亦然，「灰姑娘遇見王子」式的愛情劇原型，被極富技巧地改寫為帶著啟蒙惆悵的成長小說。故事中身為普通雇員的臺灣女孩佳瑋，幾乎要背著男友，投入香港籍的跨國公司經理人夏杰甫的懷抱，這表明某種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通俗情感：中產階級女性渴望藉著婚姻往資產階級上升。而張國立的〈王總父親的必勝之道〉，則把這一主題寫得更赤裸：女主角林萃千方百計地，只求製造「偶然」與甫離婚的董事長之子相遇的機會。換句話說，在廣泛的愛情主題之中，當代臺灣小說常常把戀愛的成功與否，聯繫於社經地位的提高。這其實是一種對「階級流動」的樂觀態度，因為「愛情」就是對於階級社會的個人化解決方案，即使故事裡「愛情」不一定成功，但它仍與較低社會階級嘗試克服結構的願望重疊在一起。⁸

在上述的這些作品中，他們共享的後現代哲學其實不難辨認：這些作品一致地表現出，對於愛情這樣嚴肅高尚的情感的嘲弄。然而，儘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再相信愛情，但他們卻往往相信，「階級差距」可以隨著如今已然輕快的「愛情」逐漸被填平。這當然有些諷刺，雖然愛情不再珍貴，但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鴻溝，似乎也沒甚麼大不了的。我們看到，這些當代戀愛故事中所要追求的東西，在親密與信任之外，其實是通往「經濟生活的安

8 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這些文本裡，階級較高的那一方幾乎都是男性。

全」或是「朝向上層階級流動」。心心相印、死生契闊這種遙不可及的古典神話，現在卻成為每個挑肥揀瘦的買主，打算透過婚姻而改善經濟地位的交易，並且被那些過度訴說真誠的後現代修辭所記錄。若用馬克思式的術語來解釋，婚姻，原本屬於人與人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具體社會關係，如今更接近於單獨個體走進愛情市場時，透過選購而得的「與社會分離的某種商品」（用婚姻來交易「階級地位」）。

我認為當代小說對於愛情此一主題的變奏，是很有其社會意義的，因為這個變奏回應了我們前面說的，一般中產階級的「需求與欲望」：也就是為了使資本主義體制能夠在普羅人民中獲致合法性，那麼，一個成功的經濟意識形態就必須督促自己去完成「說服大眾」這一任務。這即是說，屈從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臺灣社會中，所謂「愛情」，已經受到階級社會的重新塑造，並且悄然變質：愛情曾經是人文精神裡最被珍貴、最受歌頌、最不該有功利盤算的事物，但是現在，它已經捲入了關於社會地位與經濟生活的奮鬥，它也是階級流動過程中，脫離苦海的那根蜘蛛絲。愛情依舊是人類最渴望的東西，只是不再純淨和天真，因為它更反映了，人在階級社會中努力提高自身階級位置，甚至不惜以身相許的強烈願望。

五、沒有替代方案的資本主義：後設小說中的「庶民觀點」與「歷史發展」

在當代臺灣小說的「愛情」主題背後，其實是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某種一般性的、冀求地位晉升的情感。然而，也是這種遵循於體制、向上流動之欲望，使得推翻體制或是反對體制顯得並不迫切——這說明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個人層次所發揮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臺灣中產階級又是怎麼看待超越個人層次的「集體行動」問題呢？這裡我說「集體」的意思是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並不只是關係到人們如何期望或是經營自己的日常生活，它同時也關係到，每一個單獨的個人，如何去思考國家、社會、經濟等等宏觀的問題。換句話說，後現代文藝思想作為「中產階級文類」的重要構成要素，是怎麼看待臺灣人在近代化中的集體命運，也就是資本主義這一經驗的「歷史性」呢？

與「愛情」這一詞彙所反映出來的微觀政治不同，「歷史」這一論題，必然涉及了集體身分、社會變遷，以及對於該變遷的政治評價。為了看出臺

灣後現代美學如何看待「歷史」與集體的政治，我認為關注臺灣後現代文學中的「後設」技巧，尤其是有益的。因為歷史作為一種擅於壟斷與剪裁的集體敘事，常常是後現代主義所欲除之而後快的首要對象。例如平路〈驚夢曲〉、〈按鍵的手〉；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楊照〈往事追憶錄〉等等，都直接處理作為整體的臺灣社會在長程時段中的變化。然而，這裡我不選擇上面這些在字面上能夠很快連結於臺灣歷史與經濟發展的小說文本，我打算深入討論張大春的另一傑作〈如果林秀雄〉，儘管乍看之下，該篇小說對鄉土文學的批判遠遠明顯於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悅納。

在我看來，〈如果林秀雄〉一方面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後設技巧，另一方面又把「經濟發展」與「政治判斷」從「普通人民」的角度進行了耐人尋味的連結。〈如果林秀雄〉似乎是一篇對於鄉土文學以及寫實主義美學極盡嘲諷之作，然而，我們依舊能夠在這篇不太遮掩其對於寫實主義的敵意、並以賣弄敘事技巧為導向的典型後設小說當中，看出某種聯繫於階級的政治意識，以及在臺灣經濟奇蹟中受益的都市中產階層，他們怎麼去思考社會變遷、歷史走向這一類的「宏大敘事」問題。

這個故事本身是很狡猾的，它講的是在經濟奇蹟中期的臺灣社會，一位充滿憤怒與知識分子使命感的年輕大學生林秀雄「前半生的故事」。閱讀本篇的時候需要一點專注，才能夠分辨出來，〈如果林秀雄〉的寫作技巧，是怎樣地蓄意把「林秀雄真正經歷的過往」混在「林秀雄沒有走上的人生岔路」當中。每隔幾段，小說敘事就去發展各個沒有在「現實林秀雄」之中發展的無數支線，「如果林秀雄那時候如何如何，他現在就怎樣怎樣」，以諷刺鄉土文學敘事中老調重談的、各種一本正經的悲苦與壓迫（張大春言下之意就是說：鄉土文學的老前輩啊，你們都只挑那些政治正確的「偶然」來說！！）。

因此，我們若要解讀這個故事，得先繞過這些「如果」，先找到故事中一脈僅存的「現實中的林秀雄」。在故事中，（沒有走上「如果」分支的）「現實林秀雄」最終就讀於臺北的知名大學森林系，並且發動了一次保衛家鄉的環境運動，以反對都市資本對於山村故鄉的進駐。但是通過讓讀者有些眼花撩亂的後設技巧，張大春描述了「如果林秀雄」的諸種平行世界，去對比於那個變成社會運動者與環保鬥士的「現實林秀雄」。其他那些沒有投入環境運動的平行林秀雄們，也就是作為對照組、留在寫實主義敘事中的所有「鄉土小人物」們，他們其中一位是罐頭工廠出納員、一位成為被小工廠主

剝削的西點麵包學徒，另一位則是小學時便輟學加入了將來會在商業上大獲成功、並轉型進入電視頻道的布袋戲班，還有「其中一個林秀雄變成軍官，學會打橋牌、喝咖啡牛奶，只吃軍官俱樂部的牛排，而且能說一口完全不帶鄉音的國語」(1988b: 115)。關於「林秀雄們」的集體命運值得仔細思索，因為除了現實中成為知識分子的林秀雄「之外」，鄉土人物的其他可能都通向我們所生活的真正臺灣歷史：他們緊密地被嵌入資本化、工業化、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的臺灣社會。

事實上，就連「現實中林秀雄」都與臺灣實際走上的那條資本主義民主的現代國家之路關係無比緊密：故事中「真正存在」的那個林秀雄，因為被村中首富收養，故而在臺灣現代化過程中，成功地將農村土地資本轉換為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才有機會走上大學生之路（而不是和其他平行時空兄弟們一起成為便宜耐操的基層勞動力）。當我們把每一個林秀雄的生命經歷互相比較，可以看見這篇小說其實持有一個些許惆悵的歷史觀點：無論林秀雄的生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偶然，但是在整個臺灣社會、臺灣社會裡的無數山村小鎮、以及鄉村中高高低低的林秀雄們，所有人都被無情地捲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這才是歷史的必然。這故事不只比對了資本主義的必然與庶民生命的無數偶然，且讓我們想起馬克思這段名言：「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Marx 1972d: 82-83)。這也就是為什麼，故事中「真正發生」的那場環境運動，絲毫得不到鄉親父老的支持。因為，鄉親們渴望的是「新的生產關係」，而傳統的農村經濟與土地利用方式反而被視為「生產力的桎梏」。故而村人們對於開發以後「全五寮村都在路仔邊，地貴房貴人也貴」(1988b: 120)這樣的繁華景像，抱持有無比的憧憬，於是自然無人跟隨膽敢挑戰資本主義巨人的這位風車騎士林秀雄。這裡點出左派知識分子與普羅大眾的反差，也勾勒了臺灣社會大眾對於資本主義路線的普遍認可，人們甚至將污染與徵收視為經濟發展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其實是（後現代美學所要嘲弄的）寫實主義與鄉土文學的道德觀點背後的，必然社會前提。

故事中，張大春還插入了一個訕笑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細節。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黑格爾的「辯證法」原本占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理性位置，為的是處理不同生產力的歷史時期，如何揚棄上一階段的生產關係，以邁入下一階段更進步的生產關係。然而，在故事中，林秀雄這位力拒資本化的本土（左

派) 知識分子, 其實也有一個來自於私人經驗的「偽辯證法」, 當他在學徒期間, 躲在工寮宿舍破床上手淫, 卻被其他學徒撞見而惱羞成怒的當下, 林秀雄悟出了一種類似於馬克思辯證法的教義: 「凡存在者, 必然有其合理」、「靠著這套方法, 林秀雄在那間小小的儲藏室裡對全世界宣戰。首先, 他鬥爭自己。他認為, 林秀雄的一切早已被這個容納他的世界決定了。他的所作所為, 以及所有的思想, 都是這整片山區的產物」(1988b: 117)。張大春極為不厚道地把扭曲後的歷史唯物論, 頒贈給未來的左派運動家林秀雄。

在馬克思的辯證法, 資本主義的存在是爲了促成生產關係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從而引爆社會矛盾、促成無產階級革命(Cohen 1991: 30-32), 但是, 在臺灣版本的、犬儒地承認資本主義的後現代綱領所扭曲後的辯證法裡, 「存在有其合理」則是爲了要替無從阻擋的資本化、工商業蓬勃來背書。〈如果林秀雄〉透過展示不同的「林秀雄人生歷程」, 來說明無論哪一個林秀雄存在, 都只能是百分之百合理的。因爲「所有的」林秀雄背後, 臺灣社會的資本主義進程在那裡自顧自地往前邁進, 因此, 林秀雄這個後設的孫悟空, 無論人生如何波折, 都只能在資本主義這如來佛的五指山下, 寫下無可奈何的到此一遊。張大春在此的表述, 不只嘲諷了寫實美學(以及其背後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 更進一步地說, 〈如果林秀雄〉裡的意識形態, 雖然不能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擁抱贊許, 但該故事卻訴說了無限擴張的資本主義的不可撼動(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其合理性了)。

同時, 這篇故事的歷史性解讀還可以引申出對於階級意識的集體解釋: 爲什麼像故事裡的現實林秀雄那樣, 反對盲目經濟發展的左派, 終究是臺灣社會裡的極少數? 這裡我們要引用分析哲學家柯恩(Gerald Cohen, 1941-2009)所言: 資本社會中的「集體不自由」。對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單獨個體而言, 他當然有機會脫離被剝削的工人處境, 透過創業或是其他機會成爲較高階級, 然而, 此個體脫離自身階級的「可能性」或說「自由」, 其實是受限於其他的階級同伴不去競爭上面那條, 名額有限的晉升之路此一條件之上的。故而, 即使被統治階級的單一個體, 可能有離開該階級的「自由」, 但是從整體而言, 整個階級的所有個體之間構成了某種互相限制、而缺乏脫離該處境的「自由」(Cohen 1986: 248)。按照此一解釋, 我們也能夠類似地去思索〈如果林秀雄〉所提出的歷史命題: 「爲什麼臺灣左派終究不成氣候?」或是用我們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來說: 「臺灣本土文化之中爲何缺乏階級意識?」——因爲在無數的可能林秀雄之間存在著類似的「相互限制」, 對全

部的林秀雄（林秀雄也意味著臺灣一般人民）而言，脫離體力勞動，成為中產階級的佼佼者、也就是成為擁有足夠思想以去洞悉結構性限制的知識菁英，這樣的上升機會總額是有限的。只有出於偶然或幸運的一個兩個，能夠成功地晉身為「有學問有知識的人」，並且運用此知識來形成質疑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如果林秀雄〉裡，其隱隱約約所透露出來的歷史觀點是：「除了發展主義、除了工業化與現代化，我們還能往哪裡去？」，在此，我們終究看見一種無可奈何的宿命觀點，那是採用了後現代主義所背書的懷疑論，來回應馬克思的歷史命題：「反資本主義」這一歷史敘事之所以可能，只能夠建立在資本主義自身的普遍歷史語法當中。

因此，張大春的〈如果林秀雄〉，無情地說明了結構（強大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主體（自我設限的階級意識）之間的某種交纏。一方面，「社會結構」限制了無數的庶民林秀雄去發展解放意識；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林秀雄那沈重的呼籲，在資本化、發展主義的歷史背景裡，也只能是石沈大海。賴特曾經如此提及階級意識的時間面相：那些強調結構的馬克思理論家，其實強調的是階級意識的「未來」，因為在既有結構下，勞動階級的潛在利益其實是相同的，故而階級意識應當是對於還未實現的平等社會的共同企盼。而相對地，那些強調個體與能動性的社會主義者，則更為重視階級結構的「過去」，因為只有「過往的共同經驗」，才能夠賦與特定階級具體的情感與認識（而這自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階級意識之根源）（Wright 1997: 494-495）。從這個區分出發，再來對照〈如果林秀雄〉，我們就能看到兩種不同類型的「階級意識」：知識分子林秀雄思考的是「未來」臺灣社會的長遠利益，故而他的「進步階級意識」激進地把五寮村人的利益表述為「環境正義」。相反的，那些漠不關心生態問題、只想要發展建設、砍樹蓋產業道路的鄉人，他們的意識則是由「過去」臺灣社會現代化之歷史際遇所決定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故而，村民對於「賺大錢、拼經濟」以外的事情漠不關心。在小說中，林秀雄與鄉民，或者說知識分子與普羅人民，或說「思考未來」與「受過往決定」的兩個群體間的反差，正是臺灣社會中一直未能成形的「階級意識」的縮影：我們更寧可在短暫的經濟榮景或地產炒作等金錢泡沫裡雨露均沾，而不是考慮公義永續的社會環境該被如何打造（可以說正是第三世界被動現代化的經濟殖民歷史，決定了社會大眾的思考與政治選擇）。

當然，從文學批評的角度，我們自然不能將作者的政治判斷與小說中描寫的臺灣大眾重疊起來，但至少我們能說：〈如果林秀雄〉這樣一個聰明促狹

的故事，精準地轉譯了在生態與開發兩難背後的政治判斷：「資本主義」深刻地形塑了，短視並且急功近利的大眾情感趨向。一般人民想要的就是「經濟發展」而非「社會正義」。誠如前面提及的，臺灣後現代小說與資本主義道德信念之間，始終曖昧地過從甚密，故而「臺灣後現代」的調侃一直都有其針對性，比起消費主義或是市場領域，總是板著臉孔因而有些可笑的「社會主義理想」，就在此故事中以「現實林秀雄」的形貌出現，並且無從迴避普羅人民對這一姿態的輕蔑。透過〈如果林秀雄〉這樣直接與左派政治信念對話的文本，我們尤其能看到一則強烈的主題：對於勞動階級、普羅人民而言，他們真正的「欲求」，仍然是許諾富貴、許諾階級晉升的資本體制。

六、結論

在盧卡奇看來，統治階級、資本家階級所發展出來的主導性思想範疇，總是試圖歪曲、隱蔽現代資本社會中種種嚴苛的經濟等級與社會不平等。而只有當人們「識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要隱瞞的經濟宰制之本質，勞動大眾才能夠真正成為認知與行動的主體，並對階級關係做出適當回應(1989b: 205)。所以，假如勞動者未能看穿物化現象、商品機制、剝削過程等，換句話說，如果不能克服「虛假意識」對於真實的遮蔽，那麼就沒有機會發展出理解現實的階級意識。

從此一論斷，我們能較深入思考臺灣的後現代小說作品，在這裡，「虛假意識」往往代替了對真實階級利益的認知。即使這些小說不乏對於階級不平等現象的描寫，但是正如前面對於該文類所作的意識形態考察：在許多作品中，角色們找不到表述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語彙、沉迷於由品味所標示的中產情調、或天真寄望愛情或婚姻可以是階級上升的通路、並認可臺灣現代化途徑上無可避免的資本主義階段。對於許多具有後現代色彩的小說文本來說，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似乎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狀態，唯有依靠個人的努力以突破之。⁹

9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臺灣後現代小說中，雖然階級藩籬有機會在個人努力下被打破，但是該文類很少提及有階級性格的集體行動。這也就是說，雖然後現代小說常常觸及因資本主義而階級分化的社會，但卻很少想像「階級革命」或「政治變革」這樣的出路。

其實，早在1970年代，美國の後現代思潮開始在人文藝術領域萌芽時，就已經被懷疑是「文化與商業的可疑交叉」、「藝術家與資產階級的共謀」(Anderson 1999: 12-13)，而這種「中產階級美學趣味」一旦移植到初嘗富裕滋味的臺灣，更是大量消耗了其內在的批判能量，成為某種裝飾性的語言遊戲。歷史地看，臺灣最早の後現代引介者們，本身對於後現代思想的左派傳統沒有完整的認識（廖炳惠2000：85）、也沒有興趣發展本土視角的反思（陳光興 1990）；再從結構面言，由於戰後臺灣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整編進入成熟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也使得臺灣從未真正經歷歐洲社會在工業革命早期，毫無節制的勞動力榨取或是尖銳的階級對立。¹⁰由是，在缺乏社會主義傳統的土壤裡，「後現代主義」內部原本就不占主導的、對於階級關係的有限反省，自然更沒有生根發芽的機會，反而是其華麗的形式美學，在我們的小島上開出妖嬈的文學花朵。¹¹

上述特質，其實也是「翻譯的」臺灣後現代的歷史性格。儘管在西方後現代思想的傳統裡，除了「遊戲」的歡快之外，多少還保有「批判」和「顛覆」之可能性；然而，淮橘為枳，臺灣後現代文學更大的欲望，似乎在於掩蓋資本主義深層的運作邏輯（林淇濱 1995）。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一一分析其意識形態前提時，會發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後現代文類的高度親善。現在可以回到本文的基本提問：當代臺灣小說是否存在著階級意識？

如果我們所說的「階級意識」，指的是較嚴格的馬克思意義下，那種與其他階級成員互相認同、並且為了共有利益而發起政治鬥爭的強烈集體認同，那麼，在當代臺灣小說，顯然未能符合如此的標準。但是如果把關於「階級」的自覺，限制於特定階級所持有的信念、思考方式、情感傾向、或韋伯定義的「生活風格」，那麼，臺灣小說的「階級性格」倒是相當明顯：那種聚焦於美學展演、肯定個人努力的階級流動、歌頌臺灣經濟成長歷史等等特質，表現出臺灣中產階級一般性的情感與思想。本文試圖說明的是，後

10 如果考慮不同歷史階段的資本主義具體形貌，那麼也許必須承認，在當代資本社會裡，社會階層往往是建立在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構之上，而不是被穩固的經濟位階或是剛性的政治集體所決定(Waters 1997: 33)。

11 其實，所謂「後現代思想」，在不同的學門引起的反響也很不相同，文學可能是其中收獲較豐者。汪宏倫就注意到，在臺灣嘗試引介後現代思潮的過程中，是以人文與藝術學科為主要的推手，至於直接繼承「現代性」知識典範的本土社會科學學門，則很少去談論所謂的「後現代」問題（汪宏倫 2010：514）。

現代小說文類對於臺灣社會中的階級關係、以及資本主義在經濟面的進展，常常採取了一種無可奈何的默許姿態，這混合了對於「美好生活」、「有品味的中產文化」、「上流社會」這類俗世天國的嚮往，也混合了對於歷史與革命問題的一種馴順的觀點：缺乏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邪惡，似乎小於資本主義本身帶來的邪惡。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文華。2000。《蛋白質女孩》。臺北：時報。
- 平路。2003。〈驚夢曲〉，收錄於《玉米田之死》，頁127-152。臺北：印刻。
- 。1988。〈按鍵的手〉，收錄於《五印封緘》，頁130-142。臺北：圓神。
- 朱天心。1997。〈第凡內早餐〉，收錄於《古都》，頁83-108。臺北：麥田。
- 朱天文。1992。〈世紀末的華麗〉，收錄於《世紀末的華麗》，頁155-182。臺北：遠流。
- 。1992。〈帶我去吧，月光〉，收錄於《世紀末的華麗》，頁88-123。臺北：遠流。
- 汪宏倫。2010。〈臺灣的「後現代狀況」〉，收錄於《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頁501-521。臺北：群學。
- 林洪養。1995。〈「臺北的」與「臺灣的」：初論臺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收錄於《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鄭明俐編，頁165-180。臺北：時報。
- 林耀德。1990。《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臺北：聯合文學。
- 吳乃德。1994。〈階級認知和階級認同：比較瑞典、臺灣、美國和兩個階級架構〉，收錄於《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論文集》，許嘉猷編，頁109-149。臺北：中研院歐美所。
- 李昂。2001。《迷園》。臺北：麥田。
- 郭華。2003。〈偷心賊〉，收錄於《好個翹課天》，頁59-105。臺北：印刻。
- 張大春。1988a。〈四喜憂國〉，收錄於《四喜憂國》，頁123-150。臺北：遠流。

- 。1988b。〈如果林秀雄〉，收錄於《四喜憂國》，頁106-122。臺北：遠流。
- 。1992。〈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裡的時間角力〉，收錄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著，頁5-17。臺北：遠流。
- 。1996。《野孩子》。臺北：聯經。
- 張啓疆。1996。〈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收錄於《俄羅斯娃娃》，頁5-38。臺北：九歌。
- 張國立。1992。〈王總父親的必勝之道〉，收錄於《都市男女兵法》，頁143-159。臺北：遠流。
- 楊照。1994。〈往事追憶錄〉，收錄於《往事追憶錄》，頁11-120。臺北：聯合文學。
- 陳光興。1990/02/23、24。〈炒作後現代？：評孟樊、羅青、鍾明德的後現代觀〉，《自立早報》，副刊。
-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下）》。臺北：聯經。
- 黃錦樹。1996。〈神姬之舞：後四十回？（後）現代啓示錄？〉，收錄於《花憶前身》，朱天文著，頁255-283。臺北：麥田。
- 葉啓政。1991。〈臺灣「中產階層」的文化迷思〉，收錄於《臺灣社會的人文迷思》，頁111-131。臺北：東大出版社。
- 廖炳惠。2000。〈臺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錄於《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周英雄、劉紀蕙編，頁85-99。臺北：麥田。
- 蔡源煌。1990。《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文學術語新詮》。臺北：雅典。
- 羅青。1989。《甚麼是後現代主義》。臺北：學生出版社。
- Anderson, Perry（安德森）著，王晶譯。1999。《後現代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臺北：聯經。
- Bell, Daniel（貝爾）著，高銛、王宏周、魏章玲譯。1989。《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臺北：桂冠。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包勒斯、金蒂斯）著，李錦旭譯。1989。《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臺北：桂冠。
- Callinicos, Alex（柯林尼可斯）著，萬毓澤譯。2007。《創造歷史》（*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臺北：群學。
- Cohen, Gerald A.（柯亨）著，結構群編譯。1991。《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

護》(*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臺北：結構群。

Eagleton, Terry (伊格頓) 著，方杰譯。2006。〈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形態及其興衰〉(“Ideolog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Western Marxism”)，收錄於《圖繪意識形態》(*Mapping ideology*)，Žižek, Slavoj編，頁234-297。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Von (恩格斯)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反杜林論〉(“Anti-Dühring”)，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619頁-641。北京：人民出版社。

Harvey, David (哈維) 著，閻嘉譯。2003。《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北京：商務出版社。

Lareau, Annette (拉魯) 著，焦小婷譯。2010。《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Lukács, György (盧卡奇) 著，張西平譯。1989a。〈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收錄於《歷史和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頁51-91。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

——著，張西平譯。1989b。〈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Ret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letariat”)，收錄於《歷史和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頁92-168。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馬克思)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著作編譯局編譯。197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72a。〈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598-703。北京：人民出版社。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72b。〈《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81-85。北京：人民出版社。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a。〈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頁593-656。北京：人民出版社。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b。〈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1卷，頁507-591。北京：人民出版社。

Thompson, Edward P. (湯普森) 著，賈士衡譯。2001。《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南京：譯林出版社。

Weber, Max (韋伯) 著，閻克文譯。2007。《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外文書目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Sung-sheng Yvonne. 2004.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erald. 1986. "The Structure of Proletarian Unfreedom,"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John Roemer, pp.237-2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es, Peter. 2004. *Language & Hegemony in Gramsci*. London: Pluto Press.

Tsay, Ruey-Ming. 1997. "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in 《九〇年代的臺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張笠雲、王昌甫、呂玉瑕編，頁15-55。臺北：中研院社會所。

Waters, Malcolm. 1997. "Inequality after class," in *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David Owen, pp.23-39. London: SAGE.

Willis, Paul E. 1981. *Learning to labour :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Aldershot: Gower.

Wright, Erik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